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 首页 - 国外流派研究

德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述评

周穗明

2006-9-14 11:30:37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德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应对后现代主义过程中的理论转向。在这一转向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理论已经从1968年以前的,从高科技高消费条件下分析工人阶级的异化问题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异化问题而形成的“工人阶级融合论”,转向了70年代以后的公共领域民主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后人,哈贝马斯的学生克劳斯·奥菲(C. offe)则专门研究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扩大对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尽管德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坚持理性主义传统,反对后现代主义解构理性,破坏民主社会的地基,但是其社会理论深受“后学”时尚影响,明显扩展到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新问题域,它对多元主义激进民主的倡导也与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取向和目标相契合,表现出“去马克思化”的趋势。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一致认为,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维持利润率不下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职能,而福利国家、代议制民主制度已成为国家实现这一职能的重要制度保证。福利国家有效地协调了资本与劳工的关系,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奥菲指出,福利制度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化的支持系统,其功能在于维持资本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队伍。福利计划的制度化改变了战前的工业阶级斗争的模式,并且带来了“更加经济主义的、以分配为中心的、日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他认为,福利国家通过对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作出让步,消除了它们进行斗争的动力。工人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为充足的利润率和投资水平保证了支持用于福利项目的经济剩余的产生。而资本家也接受了基本工资要求和福利国家开支,因为后者确保了一个健康顺服的工人阶级的存在。同时,奥菲接过福柯后现代国家理论的话题,进一步分析了福利国家所体现的强制性,他着重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复杂化,国家对各种偏离规范的行为也越发敏感,因此从身体到心理对个人的控制越发严密。从反对吸烟酗酒到交通安全教育,国家发展出一整套行为控制制度,过去被视为纯属个人的私事也成了国家关心的问题。奥菲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引发的危机的反应。他关于国家功能扩张及其实质的论述显然打着后现代主义的烙印。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糊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因此,所谓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是过时的、不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哈贝马斯批判性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项基本假定”,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和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在后工业社会,许多以往被马克思看做是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不但不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对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影响。“进化优势将从经济领域转到教育和科学系统”。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形成的基础不仅要到一般商品生产过程中去寻找,而且要到“上层建筑”中去寻找;晚期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中,“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了一个人”。哈贝马斯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冲突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已经缓和;冲突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更确切地说,新的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领域中形成的”。哈贝马斯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不承认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其他结构的决定作用,从而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经济结构和历史地位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用基于差异的文化冲突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

在上述去阶级化分析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以合理的交往行动取代劳动在传统的社会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性”取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民主的“协商政治”取代了基于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从而实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重建”。交往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性协议,要得到一致性协议就需要借助话语进行主体之间的对话,而只有通过对话或协商,才能获得立足于主体间性的真理,实现共识,推进法律和民主建设。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在道德领域,还是在法律和政治领域,都需要贯彻协商原则,于是就产生了协商伦理学和协商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哈氏以交往理性为支柱来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认为公共领域不是“国家机器”或“经济领域”,而是民主社会的“参与”,是一种“话语领域”(discursive field)。因此,市民社会概念应被解释为思考共同事务和共同利益的话语互动,它体现了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出发,把公共领域当作权力斗争的领域,倡导基于对话的“参与民主”,从而为90年代西方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中心的激进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从批判理论走向建构理论的一个转折。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霸权的批判走向对更多元的民主社会的建构,应视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一个发展。在里根、撒切尔主政后资本主义出现发展高潮,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传统的左翼批判理论频频失灵的历史大背景下,哈贝马斯标榜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的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理论为西方参与式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打造了理论基础,因而很自然地在西方学界和西方社会流行开来。这一理论在当代条件下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哈贝马斯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民主、话语互动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权力抗争取代了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以差异认同为特点的激进民主政治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以争取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会的目标取代了无产阶级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建立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思想,错误地对马克思基于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一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冲突理论进行了全面“重建”,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损毁。

(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编辑)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